

西学东渐对鲁迅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影响

贾蔓*

- 一、西学东渐对鲁迅文学形态的影响
- 二、西学东渐对鲁迅文学观念的影响

〈국문초록〉

중국현대문학은 줄곧 활발하게 연구되어온 학문분야로서 연구의 역사가 유구한데, 文學 現場에 대한 연구가 많이 있지만 문학사에 대한 연구는 더 많은 편이다. “서학동점 西學東漸”은 중국현대문학의 문학창작에 있어서나 문학관념에 있어서 모두 심원한 영향을 미쳤는데, 중국현대문학의 발전에 관심을 갖고 있다면 魯迅에 대한 연구는 빼놓을 수 없는 핵심주제라 하겠다. 본 논문에서 필자는 무수히 많은 고찰 가능한 영역 중에서 魯迅文學의 文學形態와 文學觀念에 초점을 맞추어 “立人”思想의 영향을 받아 지어진 魯迅작품을 분석 대상으로 삼아, 학계의 동인들과 함께 현대문학연구를 진작시키기 위해 몇 가지 새로운 발견을 시도해 보고자 한다.

핵심어 : 西學東進, 魯迅, 文學形態, 文學觀念, “立人”思想

* 中國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教授

关于西学东渐，学界有这样的共识，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代：一是从明代至清代前期，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因为那时西学对于中学并未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至多可以叫做西学东来；二是晚清至近代以来时期，“西学东渐”名称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容闳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于1909年出版的，题为 *My Life in China&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15年，恽铁樵和徐凤石把它译成中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取的书名为《西学东渐》，西学东渐一词就广为人知了。此时西学确实对中学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如容闳书中所说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虽然西学东渐这个中文书名是译者按自己的理解而意译的，与容闳的原书名并不相同，但也确实是对原书精神的一种准确概括，故被学界所接受。

至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分子们所受影响，不得不论及“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苏雪林将“五四”定位于“西学东渐”之上，即认为生成“五四”的动力是外来而非自己生成的。在苏雪林看来，“五四”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与黄遵宪的“小说界革命”与“诗界革命”，从广义上观照，“五四”应该与晚清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体的，她明确表示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哲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断言“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之直接者当然是哲学思想与文学名著¹⁾”胡适和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为白话文和新文学设置了语言和思想齐头并进的两条道路，主要是围绕“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展开，“活的文学”是关于文学语言形式，而“人的文学”则指新文学思想建设，它们相辅相成，共同完成新文学运动。

1) 苏雪林.《中国文学史略》. 乐山：国立武汉大学出版所，1938.

一、西学东渐对鲁迅文学形态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诞生的，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先驱，因而其文学形态和观念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考察鲁迅文学形态所受影响，这里不以文学史上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例，而以名不见经传的鲁迅真正的第一部“新小说”《怀旧》为先进行阐述。现代小说文学史家多把“五四”现代白话小说称为新小说，以区别之前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这划分是否科学，值得商榷。小说之新旧不仅在形式和语言，更要在其内容，在其精神。鲁迅写于1911年的小说《怀旧》，刊载于1913年4月25日上海《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署名周遒(chuō 意愈走愈远)。鲁迅逝世后，才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与后来创作的《呐喊》小说集，同样充满了反封建热情，与“五四”时代精神一致。不能因用文言文所写，就归为旧小说，至少是文言向白话过渡时期的小说。

夏志清直言“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²⁾”实际上，《怀旧》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特色上，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风格，具有鲜明的西式新体小说技法特点。小说在刻画人物时运用的白描手法，诸如“画眼睛”、“传神”技巧尝试，也很明显，书中人物王翁、李媪面对辛亥革命巨变而“弗改常度”的麻木冷漠，将能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革命当作“噩梦”的愚昧无知，一心盼望发财想爬上去成为主子的贪欲等劣根性，都是通过对其神态、话语和梦境的简要描摹而表现的。小说写道，“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辛亥革命爆发了，消息传来，人们惶惶不安，四处逃窜，人多如“蚁阵”；“而敝衣破履，日日食菜，面黄肿如秋茄”，神态描写逼真形象如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3页。

“秋茄”；“独见众如夫人，方检脂粉芴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篋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动态描写透露出浓郁的讽刺意味；“啊！甚事？梦耶？……我之噩梦，亦为汝吓破矣”，呓语梦境的简明勾勒。最后经消息查证，革命军将来的传闻，实为一拨外地难民路过此地所引起的虚惊，于是众人皆释然，一切重归平静，所谓“长毛”皆为“山贼海盗白帽赤巾”之类，王翁李媪们视为逆贼，“此种乱人，运必弗长”。与《阿Q正传》同出一题：封建统治腐朽不堪，辛亥革命不彻底，百姓愚昧无知。

鲁迅是公认的文体学大家，这与其小说弥漫着“情味儿”相关联。周作人曾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些特别，却具有文学的特质，也就是写实的小说。”³⁾在“五四”作家看来，西洋小说大家几乎全都注重人的心理描写。莫泊桑很能表现小人物的“真实心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开后来心理分析小说之先路”⁴⁾；曼殊斐儿“是个心理的写实家”⁵⁾；……评论者们都是“五四”时代一流的作家，而且大都学贯中西，有比较高的艺术鉴赏力，呈现出这一代人的兴趣所在。在西式小说中找“诗趣”，这种文学评论形式无疑更带有民族特色。那些奇异的想象、瑰丽的色彩、抒情的调子，似乎皆仅存于传统的诗歌里。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这一核心要点，如今被排挤到小说的边缘，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面貌，一种喜乐的情愫，一幅写意的悲惨的画面。“也许是可爱的梦境，也许是凶噩的魔魔，也许是一篇像音乐般令我们缠绵不舍的文字。”⁶⁾这就难免“五四”作家必须新造出“抒情诗的小说”这一术语，来称谓这么一批不似小说的

3) 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议后记《点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年)。

4) 郑振铎：《文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323页

5) 徐志摩：〈再说一说曼殊斐儿〉，《小说月报》16期3卷(1925年)。

6) Bliss Perry：《小说的研究》(中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264页

小说。鲁迅小说也不例外，小说的抒情性特征非常显著，因此而“发明”的鲁迅小说的思想意象、语言意象及其由此构成的语言单位和句型结构，更是鲁迅文学形态转变的鲜明特征。

意象的升华便有了意境。鲁迅小说意境沉郁，弥漫着黑暗时代的悲凉气氛和作者的忧愤情愫，具有抒情诗的旋律。鲁迅的作品之所以让人经久不忘，正是因为它们以其性格鲜明的艺术典型及其创造的艺术境界感染了读者。小说所具备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吸引着读者的首先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曲折多变的情节，震撼人心的冲突的诗意要透过这些宛如生活原貌的人和事才能被发现。小说中的意境较隐晦，它多半融化在构成小说的诸因素如人物、情节、环境、语言、抒情、描写中。是否存在意境，是衡量小说艺术感染力大小的一个重要依据。鲁迅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其小说中的景物、人物、场面、语言等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表现伟大主题的介质。鲁迅小说意境的创设有其独有特征，他不仅仅以单一的局部的景与情的融合构成诗似的意境，而是制造一种缠绕整个故事情节的气氛气，使读者自始至终为这种“空气”所缠绕，不得轻松。换个角度理解这种“氛围”实际是笼罩整个小说的一种情绪，读者能感受到却看不见，它是无所不在的。如《祝福》、《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同人物命运、性格相协调的氛围气不仅烘托着人物和主题，而且形成意境，产生移情动魄的感染力和熏陶力。对于习惯于塑造国民灵魂的鲁迅而言，一方面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性和黑暗的长久性，一方面也感触到了愚昧者的善良意识的虚幻性。因而纵观鲁迅小说，都有一种相似的底色，犹如一幅景致的背景底色调，是一种沉郁而灰冷的底色，夜色正是这种底色的象征性的符号，也给鲁迅小说带来了最为特殊的美感效应。那个灰冷而奇异的夜空以及那轮苍白的圆月，在鲁迅笔下一直充当着作品底色的调色板。

《药》的开头：“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两家的悲剧便从这森冷的月夜开始，一切罪恶也在这漆黑之夜发生，在这黑夜里人们受着无尽的折磨。《白光》是一篇情调十分沉闷的作品。夜色在这里是灰冷的，鲁迅在作品中大量地渲染着寒夜的景致，使作品处处弥漫着悲凉之浓雾。当陈士诚得知自己又一次落第，回到家中的时候，巨大的夜的怪影开始笼罩着他的世界：“……最先就绝了人声，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亮，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月亮对着陈士诚灌注寒夜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⁷⁾ 黯淡、凄迷的夜色在这里折射着主人公精神形态。寒冷的月光灌注着主人翁孤寂的心绪，陈士诚心里的每次震颤，每个神色，都喷洒着夜一般的冷气。这种自然景观既带有叙述者神秘的感受，又是主人公心境的外化。

鲁迅的唯一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当描写到主人公涓生“我”走向困顿和绝望时，数次提到黑夜的存在。作者反复运用夜的意象，以此向受众倾诉着自己的情愫。这是冬春之交的事，风已没有这么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经昏黑……⁸⁾ 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⁹⁾ 涓生仿佛坠入了无底的深渊一样，痛楚的影子长久地囚禁着

7) 《鲁迅全集》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页。

8) 《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6页、第29页。

他。夜色在《伤逝》中多次出现具有暗示的含义，作者把它当成一种情绪的对物，放置在抒情的音符之中，使作品的整个韵律充满了悲戚的色调：鲁迅的小说中总是充满一种森然的气氛，从而使我们也能感悟出那重大而深刻的思想。

鲁迅是制造氛围气的巨匠。他的小说中那阴冷的底色，即黑夜和月光，实则正是一种氛围气。鲁迅小说中营造氛围气的类型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结构形态的氛围气，二是环境描写中的氛围气，三是叙述者与氛围气。

结构是构思的物化，是小说主题的外化形式，是作者根据总体构思赋予小说以特定的氛围气的一种颇为得力的表现手段。前面我们欣赏到的《白光》、《伤逝》两篇小说，那孤寂而阴冷的氛围自始至终笼罩着读者，实则就是结构与氛围气的类型，还有《故乡》绝望和希望的交织，《祝福》的悲惨、《阿Q正传》含泪的幽默，等等，都是一以贯之的空气和情绪，有相当艺术感受力的读者是不难发现这点的。《孤独者》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小说为了烘托一个失败的英雄的悲剧，通篇充塞着像死一样寂静的阴冷气氛，在结构上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大布局，中间无数情节、场面、细节的经营组合，无不使人冷彻肤骨。这样的结构框架逼迫读者进入人物独特的遭遇和情绪中去，领略小说创造的艺术境界。

小说的气氛在环境描写中会被突出地感觉到，因为小说家一般都爱在这里融入某种情绪和色调。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映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¹⁰ 鲁迅《祝福》开头这段环境描写中的情绪就很浓。年底放爆竹本是制造喜庆气氛，

9) 《鲁迅全集》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126、130页。

10) 《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但在“我”的感受中爆竹的“闪光”是从“沉重的唤云”中发出的；响是一声“钝响”，是“震耳的大音”；味是“幽微”的火药香。这里的环境描写向读者道明：鲁镇仍是封建势力控制下的中国社会一角：虽已是民国却仍保留过旧历年这守旧的习俗，等级关系和形形色色的封建观念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段暗藏着“我”对鲁镇的种种不满，同时渲染这热闹的景象也反衬出下面就要展开的祥林嫂的悲剧命运。这里借写景传达的情绪和制造的氛围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基调，抓住了这个基调就如同抓住了一部乐曲的主旋律。《祝福》后来又写鲁镇各家预备福礼的风俗和下雪的景象。其中的情绪同开头的没有什么两样：

《药》中结尾处也有几处环境描写，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一”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¹¹⁾《药》的最后的场景描写，给人的印象是极为深切的。鲁迅在讲到它时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安特莱夫是一位著名的俄国作家，鲁迅曾经翻译过他的一些小说。鲁迅称他的小说“神秘幽深，自成一家”(《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杂识》)。《药》的最后场景是阴冷的，造成一种“神秘幽深”的气氛。在坟场上，周围“死一般静”，丛冢“层层叠叠”，“枯草支支直立”，两个哀伤的老女人在这里奠祭亡灵。这样的气氛，还不阴冷吗！而恰恰在这时，“没有叶的树上”落上了被迷信的人们认为是不祥之物的乌鸦，这就更使得这里的环境笼罩上了一种幽深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和两个老女人迷信的心绪相吻合，互相交融、协调，达到了“灵肉一

11) 《鲁迅小说散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5页。

致的境地。”在这样的艺术图景中，作者逼真地展示了死者遗留给亲人们的悲凉。也是鲁迅的感情情绪之体现，环境中的情绪、气氛一般都和具体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有密切联系，作者必须用对待人物的态度对待人物周围的世界，所以鲁迅先生有时就以物的眼光和情绪来进行描绘、点染。如《伤逝》开始时的环境描写明显地涂染着男主角涓生的感情色彩：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的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黄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一下子便将读者带进人物“寂静和空虚”的心境，这心境也是小说的气氛基调。

鲁迅小说在制造环境气氛时大多不是靠比喻、形容、隐喻乃至象征的手法组合的，而经常是用叙述人的某种情绪和眼光来观察和描绘，这叙述人可能是作者，也可能像《祝福》和《孔乙己》那样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孔乙己》中用第一人称来写，叙述者“我”是酒店里的小伙计。以这个入世未深的少年的角度来审视生活，以他的眼睛来观察周围世界，鲁迅选择了一个绝好的视角。小伙计在酒店里专事温酒的差事，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枯燥了。“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他把注意力放在孔乙己的惹人发笑和遭人耻笑上，完全切合于一个孩子的心理特点。孔乙己的独特的人生命运由小伙计来讲述，取材集中在几个充满了笑声的场面上就很自然了。而这对于小说形成一种悲喜交融的调子，是非常必须的。而那些笑声正构成了一幅幅凄凉的景致，连“小伙计”都可“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孔乙己的卑微地位就更显突出了。在孔乙己那次用手“走”来并再次遭到众人的凌辱和嘲笑后，他就再也没到小酒店来过。“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

别人也便这么过。”反衬着社会对于孤苦无靠的孔乙己的冷酷无情。整部小说都是通过小伙计的所见所闻以便“我”的一些感受和想法，组成了一个一个的场面：自傲的、迂腐的、羞辱的、被嘲笑的等等。以及他最终的消失。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

《故乡》和《祝福》，也是鲁迅小说通过叙述者表达氛围气的作品。叙述者“我”一开始就出现在这两部，作品中叙述者的语态在这里带有浓烈的悲凉情调。《故乡》的开头是这样描写的：“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我约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走进“我”的世界的第一个感觉，便是严寒、深冬、阴晦的天气于是叙述者一直裹在一片冷觉之中。随着作品内容的进程，无论是对闰土境况的描写，还是对“我”的心理的表现，一直没有脱离我冒了“严寒”回到故乡去的初感。这种先定的感觉方式构成了全篇的氛围气。成人的闰土沉沉的叫了一声“老爷”后，便有了“我似乎打了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的感慨，有了“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咏叹。《故乡》自始至终的是叙述者“我”的这种感觉。作品苍凉的内蕴在叙述者的分寸感的排列下得到了适宜的表现。在《祝福》中，叙述者的语态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情绪旋律。作品一开始描写了鲁镇旧历年的夜映，接着立刻把“我”拉到鲁镇的氛围中去。鲁镇的文化形态、风俗习惯，以及祥林嫂的命运，都是借叙述者“我”来塑造的。《祝福》中连续四次出现了冷夜的描写，甚至一再出现了“我”对祥林嫂的印象、态度以及她的复杂内心感受的勾勒。其中的恐怖的氛围不单单是由祥林嫂的外在形象所带来的，而是“我”的感觉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作品中最为不安定的灵魂与其说是祥林嫂，不如说是叙述

者“我”本人，只有“我”才是清醒地意识到祥林嫂乃至鲁镇悲剧的见证者。因为叙述者自身体验并痛苦地目睹了这一段悲惨的故事。“我”既是祥林嫂命运的知情者，也是导致她死亡的不自觉的“合作者”。小说的凝滞的氛围布满了叙述者“我”的哀伤、自责的情调。

鲁迅小说的“文学话语原型”现象的生成。周作人曾提及鲁迅在小说《故乡》中，为了与闰土善良忠厚的形象相反衬和对比，还虚构了一个尖酸刻薄、贪图小利的小市民形象——杨二嫂，并为她加了一个能反映其性格形象的绰号“豆腐西施”，因而鲁迅把《故乡》列为小说文体范畴。在小说中鲁迅说明了得到这个绰号的原因：“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西施是古时越国美女，杨二嫂不过是晚清浙江乡镇极普通不过的豆腐店的老板娘，好打扮，略有几分姿色而已。把豆腐和西施并列，明显含有讽刺之意。不过，在鲁迅之前，也有人在小说中用过“豆腐西施”一语，并同样作为小说中人物的诨号。那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有位才子名张南庄，以过路人的笔名，完全用吴语方言，写作了一部专门描绘阴间鬼域世界的讽刺滑稽兼备的章回体小说《何典》。小说的第八回，描写性喜拈花弄柳的色鬼，在路上撞见了一个“标致细娘”，名字就叫“豆腐西施”，其父叫“豆腐羹饭鬼”。色鬼让自己的门客“极鬼”等，夜里装扮成强盗将“豆腐西施”抢来，不料被自己的老婆“畔房小姐”得知，受了老婆一顿好打。随后，待极鬼将抢来的豆腐西施送进色鬼房里的时候，被畔房小姐一棒打去，直把豆腐西施打得“红脑子直射”，而豆腐西施的父亲“豆腐羹饭鬼”见女儿被色鬼抢去，不但不恼怒，反而在家里高兴，以为女儿从此有好日子过了。此“鬼”的贪财好利和豆腐西施的命运不济，与鲁迅小说里的杨二嫂有几分相似。豆腐西施这一俗语的来源，周作人认

为是庶民百姓看戏文听故事时，大略知道西施是古代美女，便拿来形容美人或者爱美的人，其中包含着一些讽刺的成份，就像百姓看戏知道貂蝉的名字，自我想象并以讹传讹地以为是很“刁”的女人。这一解释颇有道理，即这是吴越一带不无讽刺戏谑成份的民间俗语，广为流传。与鲁迅不同时代、专用吴语方言写成的《何典》出现此语，即其一证。

二、西学东渐对鲁迅文学观念的影响

“我认为，一个学科、一个学者要创新，要有突破，必须从文学观念开始。文学观念更新突破了，才可能真正推动学科的发展。每一个观念和方法论的提出，借鉴和使用都可以带来一批新成果，它的贡献是卓越的。¹²⁾”同理，研究鲁迅文学创作，其文学思想观念的转化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阐述审丑意识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反对“和乐之因”，推崇恶之声，是为了实现振奋民族精神、争取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鲁迅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考虑到了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她的病根究竟在哪里？经过长期的思考后，他认为欧美列国之所以强盛，关键在于整体的国民素质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因此，鲁迅一生便以“根柢在人”、改造国民性为己任。鲁迅先生的创作，无不篇篇以“立人”为首要，诸如《呐喊》、《彷徨》等所塑众生形象，皆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主旨，力求塑造现代中国之新人

12) 王本朝：〈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创新研究路径〉，《社会科学报》第1659期第5版。

形象。

作为代表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论著,《文化偏至论》的主要意旨是通过对方近代思想文化的解读,阐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及其演变。鲁迅认为,西方的强大不是由于铁路金矿为代表的物质文明的发达、国会立宪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的完备,而是个性和精神得到发扬蹈厉的人导致西方的强盛。而中国社会部分救国心切的“轻才小慧之徒”,即晚清以来的洋务派和维新派,或者竟言武事,或者提倡“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以为这是西方强国之道。在鲁迅看来,这是“不察欧美之实”,是徒拾西方皮毛和“尘芥”,是对西学和西方思想文化的误读、谬解与“偏至”。为此,鲁迅在文章中对 20 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正本正源,从而得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数,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结论,即精神文化救国论,认为这是西学的正宗和拯救中国的要务,是应该从西方引进的新学和中国走的道路。与这种思想认识相应,鲁迅在对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阐释解读和对流俗的批判中,提出和设置了个人、个性、英哲与多数、庸众、凡庸、众志等概念和它们的对立性关系,并认为由大众构成的民主制度是“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作为例证,鲁迅举出了苏格拉底和耶稣被杀害的史实。考究起来,苏格拉底的例子更能说明民主制度的弊端。所以鲁迅的结论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

这种对英哲、天才、超人、战士、个性的崇尚和对多数、庸众、凡庸、众志的批判,其实不仅仅是鲁迅的早期思想,而是他贯穿始终的重要思想内容和资源,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诸如《阿Q正传》、《药》、《孔乙己》等作品,先觉而孤独的战士与他面对的麻木的庸众和看客,他们之间看与被看和前者被后者压制、逼疯、颓废与死亡,构成鲁迅小说最突出的叙事内容、形象、结构、关系和艺术美学特征。这样的小说

叙事内容和关系，深层里与苏格拉底的遭遇和情境具有相似性与精神的同构性。而在鲁迅后来的杂文写作中，对看客、庸众、无主名的杀人团的形象揭示和理性批判，也一直是重要内容和锋芒所向，是“这样的战士”永远高举投枪进行战斗的对象。诚然，鲁迅早期思想无疑受到尼采蔑视庸众的“超人”思想的很大影响，鲁迅自己的著作文章对此也不讳言。所谓“托尼思想，魏晋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对鲁迅写照。不过，鲁迅的蔑视庸众看客、崇尚天才，还一定程度上与苏格拉底有关联。现行的鲁迅全集有五处提到苏格拉底，最早提到苏格拉底的一段文字出自早期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一苏格拉底也，而众希腊人燬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故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¹³⁾”鲁迅对“洋为中用”的“中国化”文化逻辑“深恶而痛绝之”。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先生在鲁迅的追悼会上说：“鲁迅先生，是深山苦行的一位佛神。¹⁴⁾”某种意义上讲，鲁迅是一位为拯救世人而受难的基督。鲁迅对基督教文化采取了客观辩证的态度，在对基督教历史的考察中，他指出中世纪基督教对科学精神、思想自由的压抑，也肯定希伯来文化的璀璨庄严及深远影响。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谈及科学的历史，揭示了中世纪最简单黑暗状况，同时却说，“盖中世宗教累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鲁迅认为宗教虽压抑了科学，却孕育了社会精神的花朵。他否定、批判了基督教的创世说、天国说、奇迹说等教义，而肯定、推崇基督的救世精神。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所说：“他的信仰是在哲学，不是在宗教。”

鲁迅对《圣经》中基督之死这一幕十分偏爱，其散文诗集《野草》中

13)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14) 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鲁迅研究资料》第11期，第171页。

的《复仇(其二)》直接从《圣经》耶稣之死的章节中取材,《圣经》中的耶稣的受难是由上帝命定的,他的受难是为了他的复活,是为了对世人的救赎。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借用了《圣经》的原型,并进行了再创造,突出了耶稣受难时的心理感受和复仇心态,塑造了一个为民众而献身却不为民众理解的孤独的英雄形象。“复仇”心理的产生,既是鲁迅思想观念的转型,更是其“向庸众宣战”新思想的确立,凝聚着他的人生思考。现实生活中,鲁迅同样有与耶稣一样的遭遇,感同身受,特有体会。《复仇(其二)》中的“人之子”耶稣的描绘,鲁迅所关注的正是其身上的人性,而非神性。

“五四”时期的鲁迅,以进化论思想作为与黑暗社会做斗争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他深信“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从“立人”的思想出发,表现出对孩子的特殊关爱和期盼。这里除了进化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因素,同时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圣经》中,小孩被视为天国里最大的。基于这种“以幼者为本位”的思想,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在《故乡》中,鲁迅以充满温暖的笔调描绘少年闰土与迅哥儿亲密无间的童年。在《孔乙己》中孔乙己故事的叙事者设计为“小伙计”,初涉社会(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单纯热情,认为孔乙己还是一个好人,后来与“庸众”一起嘲笑孔乙己,再后来孔乙己来与不来(死与活)似乎都漠然置之了。鲁迅笔下的“孩子”也是《圣经》精神主旨的再创造,是具有时代之悲的“小形象”,所以“救救孩子”核心思想与鲁迅“立人”启蒙思想项吻合一致的。自1922年中国掀起的“非宗教大同盟”的反基督教运动的论争中,唯有鲁迅的态度十分冷静,几乎未见他有只言片语涉之。鲁迅是以宽容而审慎的态度,对基督教的历史和思想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努力吸取其有益的精华部分,成为他向黑暗社会斗争的精神力量。

李欧梵语“如果研究晚清文学，不研究一点晚清的思想，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纯从文本来做分析的话，没什么好分析的，没有一篇比得上《红楼梦》，也没有一篇短篇小说比得上鲁迅的《狂人日记》。¹⁵⁾”因而，言及西学东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鲁迅是第一个要探究的文学家及思想家。首先，其小说集《呐喊》、《彷徨》等所体现的文学形态的转型影响：“欧化式”体态、语气及心理技法的描写与专注“情味儿”的小说意境氛围的书写；其次，鲁迅的文学观念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高屋建瓴指出了方向，那便是“立人”文学思想，同时，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包括对待基督教文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领悟的科学的学术观和历史观。对鲁迅先生及其创作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取之不竭的宝藏。

15) 李欧梵,〈西学东渐：晚清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演讲第二讲〉,《关东学刊》2018年2月

▣ 参考文献

- 李欧梵,〈西学东渐:晚清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演讲 第二讲〉,《关东学刊》,2018年2月。
-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8月。
-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 张志平,《构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范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
- 王本朝:〈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创新研究路径〉,《社会科学报》,第1659期第5版。
- 贾蔓:《中国现当代精品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 吴秀明、郭剑敏,〈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文化选择〉,《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
- 《鲁迅全集》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苏雪林:《中国文学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出版社,1938年。
- 李永东,〈鲁迅与“西崽”:半殖民文化的焦虑与民族主义的批判〉,《求索》,2017年2月。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on LuXun's Literary Form and Concept

Jia, M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n active subject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orrelative studies. There are lots of studies on the literary scenes, and more on the histories of literature.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both the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cept towards this subject. It is necessary to do research on Lu Xun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writer analyses Lu Xun's literary form and concept from the extensive and sophisticated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In order to make new discoveries, and to share them with other scholars, the creation of wor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uXun's perception of 'Restoring Oneself' is regarded as an object to be explored.

Key Words :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Lu Xun; literary form; literary concept; perception of 'Restoring Oneself'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1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30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0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